



百年南开
日本研究文库

日本史通论

吴廷璆 著



百年南开
日本研究文库

日本史通论

吴廷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史通论/吴廷璆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7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ISBN 978-7-214-23354-7

I. ①日… II. ①吴… III. ①日本—历史—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4055 号

书 名 日本史通论

著 者	吴廷璆
责任编辑	史雪莲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页 4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354-7
定 价	8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岳兵

副主编：杨栋梁 李 卓 宋志勇

委 员：俞辛焯 米庆余 王振锁

杨栋梁 李 卓 赵德宇

莽景石 宋志勇 刘岳兵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如何使纪念百年南开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很早就开始谋划和筹备。早在2015年春节期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原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提起,想以集体展示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纪念南开百年校庆。这一提议得到了保顶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研究院各位同事的积极响应。后来经过商讨,编委会一致同意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作为南开日本研究者纪念百年校庆丛书的名称,本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百年校庆相适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应该是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业绩的展现。为此,编委会确定本文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构成。

第一,从南开大学创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刘岳兵教授搜集相关文稿四十余万字,编成了《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集,对于研究和总结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一时段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 1964 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 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 2003 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 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 20 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 1995 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

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 1964 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 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 2003 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 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 20 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 1995 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

目 录

导 读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	1
-----	-----------------	---

第一章	中日古代交流论	12
-----	---------	----

- 一 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 12
- 二 《魏志·倭人传》在日本 31
- 三 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 36
- 四 隋唐时期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47
- 五 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75

第二章	古代日本论	86
-----	-------	----

- 一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问题 86
- 二 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 88

第三章	近世日本论	113
-----	-------	-----

- 一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113
- 二 德川前期(1603—1680) 126
- 三 德川中期(1680—1716) 157
- 四 德川后期(1716—1845) 182
- 五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218

第四章 近代日本论 245

一 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 245

二 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 294

三 日本的殖民侵略与朝鲜的义兵运动 315

附论 337

一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前记 337

二 《日本近代化研究》前言 343

吴廷璆先生年谱 345

导读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

杨栋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日本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一国别史学科筚路蓝缕的成长过程中,前辈学人的劳绩值得大书特书。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吴廷璆、周一良和邹友恒是公认的“三老”。^① 在“三老”中,吴廷璆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他对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是独辟蹊径的学术研究建树,二是高屋建瓴的学科建设引领,三是培育新人的薪火相传。

一 振兴中华之毕生求索

吴廷璆(1910. 7—2003. 12),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一公务员家庭。

少时多不幸,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不满 1 岁时,父亲撒手人寰,母子寄居姑母家。9 岁慈母病故后,为叔父收养。13 岁考入两浙盐务中学。坎坷的身世和教育背景,是他从小励志自强报国的动因。

1927 年 7 月,吴廷璆中学毕业,在对国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毅

^① 见李玉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然加入北伐军,先是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先遣军司令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后转至长江要塞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10月至翌年6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处任书记官。然而,旧军队腐败透顶的恶行让他心灰意冷,遂在部队转移途中逃逸,只身潜往上海。

吴廷璆投军报国无望,遂决意再入学门。1929年7月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傅斯年、陈受颐、蒋廷黻、钱穆等大师云集的史学系,其史学功力日进,而听取法学院教授许德珩^①、陈启修讲授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更让他激情勃发无以自制。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在《北平晨报》副刊发表高尔基、契诃夫等进步小说的翻译作品,结识进步同学,初步树立了改造社会必须打倒整个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举国群情激愤。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吴廷璆积极参加北大支部的活动,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成员。当时,北平各高校学生发起敦促南京政府抗日的“请愿”活动,北大学生为了排除国民党对北大学生会及北平市学联的控制,于1931年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推翻校学生会,成立“非常学生会”,吴廷璆被推举为副主席。次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首批人员强行登上闷罐列车南下,抵达南京后,吴廷璆和千家驹^②作为学生代表举行发布会,申明了抗日主张。第二批北大学生抵宁后,国民政府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了禁止游行示威命令,北大示威团400余学生遂公推吴廷璆与张勃川^③前往司令部交涉。吴、张二人到司令部后立即被捕,于是被扣押在孝陵卫的北大学生集体绝食与当局抗争。北大示威团被强制押返北平后,非常学生会控制的《北大新闻》(三日刊)出版了“北大

① 许德珩(1890—1990),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② 千家驹(1909—2002),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运时期吴廷璆的战友,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③ 张勃川,时为北大经济系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及中国驻外大使。

一二五示威运动”专辑,其中《卫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吴廷璆手笔,这一斗争经历后来被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选作素材。

南京示威斗争结束后,校内进步学生与托派学生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进步学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2年9月,身处险境的吴廷璆在旧友帮助下到西安躲避,其间曾为省立一中讲授国语和英文。

1932年底,吴廷璆因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运动,被国民党西安当局列入逮捕黑名单,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遂匆匆逃回北大。当时北大学生“反蒋驱胡”(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斗争正酣,吴立即投入斗争,并与多名进步学生闯入校长室,要求校长下台。事后,7名学生被校当局开除,国民党宪兵三团亦开始抓捕激进分子,吴处境危险。1933年1月,吴得到同乡师长范文澜^①提供的旅费资助,泪别北大,乘船亡命东瀛。

1933年春,吴廷璆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潜心专研学问。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②教授指导下,完成题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学位论文。1936年春回国,同年8月受聘山东大学(青岛)国文系讲师,教授历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展开。已经获得河南大学副教授聘书的吴廷璆毅然放下教鞭,在叶剑英的介绍下直奔五台山东茹村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等政治宣传工作。那是个让他真切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生活愉快”“工作也积极”^③的时光。1939年11月,经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将军批准,吴绕道西安前往豫西协助中共党员范文澜工作,途中得知范所在区域沦陷,范则在向延安转移途中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逮捕,遂决意留在西安展开营救。

① 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九大代表。时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

② 羽田亨(1882—1955),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兼史学科长,后任大学总长。

③ 引文处为吴廷璆语。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吴廷璆应聘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燕京大学(成都)历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担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昌)历史系教授,此间积极参加反蒋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是杜斌丞^①、李相符^②、马哲民^③等领导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干成员,并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与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解放后,担任了武大校务委员、生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因范文澜力荐,吴廷璆由武大调任南开大学。1995年以85岁高龄离休。

在南开大学工作的46年时间里,他除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本职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校内职务为学校总务长2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首任主编11年,历史系主任及副主任17年,历史研究所所长6年;校外学术兼职有,《历史教学》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亚洲史卷负责人,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组),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社会兼职有,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二 史学研究之斐然成就

吴廷璆学识渊博,在东西交通史、亚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其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见解,在中外学界影响广泛,从而确立了史学大家地位。

① 杜斌丞(1888—1947),教育家和爱国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② 又名李士腴,中共党员,民盟组织者之一。

③ 马哲民,中共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吴廷璆治史,倡导经世致用。他在自述中表明,踏上史学研究之路出于“个人志趣”,也是“时代社会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撰写的首篇学术论文之所以把汉代西域经贸关系作为选题,出发点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的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止”^①。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步步紧逼下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面对此景,刚刚从京都帝大毕业回国的吴廷璆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文章旁征博引,推古论今,依据翔实资料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研究热现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实质。文章写道: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題,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在研究上持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②

中西交通史是吴廷璆毕生矢志不渝、潜心专研的学问领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等论文。

《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③是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这篇长达5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典

① 吴廷璆语。见《吴廷璆史学论集》前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原文载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21日版。

③ 原文载于《吴廷璆史学论集》第19—7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文献记载的史料为依据,以西方国家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及西域国际贸易的景况。论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及研究路径的设计颇为老道,而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的范围、交易形式与商品种类等具体史实的考证,细致入微,尽显超凡才华。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等,均是吴廷璆在耄耋之年发表的力作。《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①一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进、消化中国文明并进而本土化的问题。毋庸置疑,没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识积累,是无法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的。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在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调整的关键时刻,从这篇论文中,不难体察其敏锐时代意识和良苦用心。

吴廷璆是学界的常青树,其《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②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时,已是85岁高龄。这篇论文,洋洋洒洒3万余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

① 原文载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

② 原文载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而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等规律性总结,也都颇具点石成金之妙。

日本史是吴廷璆的重点研究领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关乎日本历史转折的重大问题上,他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的几代学人,对日本、苏联、朝鲜等国际学界也产生了影响。

1955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①一文,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论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化改新性质及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封建说”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

1964年,吴廷璆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②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

①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创刊号。

② 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

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吴廷璆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①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文章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三 学科建设之突出贡献

吴廷璆先生从教60年,开设了亚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维新史、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专题课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亲自指导的日本史研究硕士生或博士生多达数十人。如今,其嫡传及再传弟子遍布中国各地,“南开日研”已成为国内认可、国际瞩目的学术“高地”。

^① 收入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